

莫让信息时代成丛林时代

杨 仑

跟朋友说想吃西餐,手机APP就推送了西餐内容;与家人讨论装修,网站就推送了贩卖家具的广告,您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2018年伊始,百度、今日头条就身陷窃听门,分别被相关部门约谈。两家公司也迅速做出了澄清:均表示自身并没有窃听用户麦克风,也没有能力将用户语音进行处理、并转化为商业推送行为的能力。类似的经历,不少人都经历过。所谓大数据下无隐私,消费者所有行为都被数据化,被企业搜集、储存。从技术上来讲,笔者倒是相信两家公司说了实话:想要通过麦克风窃听录音、上传数据回服务器进行分析和

处理,之后推送相关广告,的确有点难。但回头想想却更可怕:互联网公司已经不需要窃听,就对一个人的生活习惯、个人喜好、隐私行为了如指掌。用户之所以相信所谓的“窃听”,其实是在给自己一个心理慰藉:即关闭了麦克风权限,就能够保护自己的隐私。 这种尝试显然徒劳无功。大数据、深度挖掘等新技术为信息时代写下新的注解,为生活带来超乎想象的便利。但在滚滚洪流之中,铺天盖地的并非都是你期待的便利,比如还有隐私的泄露。浪潮中想要保护自己,需要的不是小心翼翼的选择如何授予权限,而是依靠法律的力量。 我国有近40部法律、30余部法规涉及

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法网不可谓不密;相关主体窃取公民个人信息超过一定数量的,就构成刑事犯罪,处罚不可谓不重。然而实际保护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原因何在?违法成本过于低廉。信息爆炸、数据爆炸的时代,科技的迭代正在迅速将公众认识、法律法规的顶层设计甩在身后,而被侵害的个人由于缺乏足够的技术手段举证,也让违法者轻易溜走。 规则不完善直接导致的恶果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在商业竞争中,穿透客户的隐私壁垒、获得更精准的数据成为“杀手锏”“核心优势”,从而将合法合规的企业淘汰。长此以往,信息时代必将回归到丛林法则,为了利润可以践踏他人的权利与法

律的尊严。 法立于上则俗成于下。想要企业拥有道德自觉,必须依赖法律的力量,让违法者不受侵害,让违法者付出代价,这是公平公正的要义。企业为了发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必须具有正当性、必要性和合法性。 近日,江苏省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就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违法获取用户信息权限及相关问题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被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该案也获得了中消协的支持。正如美国法学家庞德所说,法律未必依靠某种外部手段来使其机器运转,正因法律规则是不会自动执行的。江苏省消协为保护消费者权益,向行业巨头说不,笔者要为这种行为点个赞。

观点速递

与其为销量数字尴尬不如梳理阅读的意义

对一些并不理想的图书销售大为敏感,未免过于忧心忡忡了。其实,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纸质阅读未必就比网络阅读带有更高级的价值意义。我们提倡阅读型社会,不妨梳理清楚,阅读的意义是什么?或许是人格的涵养、知识的启蒙、共识的凝聚。社会所该聚焦的,更当是知识环境是否足够自由畅达、包容有序,这才是阅读意义的指向所在。对于个别数字上的“尴尬”,其实倒也不必那么焦虑。 ——易之(《中国青年报》)评数据显示45%图书年销量不到10本

院士回归本科课堂应当成常态

在一流大学建设进程中,让院士们回归本科教学,实质上就是让院士们回归教书育人的本分。对院士而言,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不亦乐乎;对学生而言,从游大师,在大师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中成长成才;对学校而言,有效整合院士、名师等宝贵教育资源,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方能建设师生学习与成长共同体。 ——王顶明(《中国教育报》)评武汉大学6名院士执教本科基础课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路上 乐见民办教育新探索

在追求世界一流大学的路上,我们乐见新的开辟——总以不适应中国体制为理由去阻碍,去打“出头鸟”,也必将失去生机。民办教育在中国固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但它自身最大的亮点在于,可以摆脱体制内的束缚,作更符合高等教育规律的探索。实际上,它也在一定程度上贴合国情,西湖大学首先招的是博士,而不是本科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更快地“证明”了自己。 ——温才妃(《中国科学报》)评施一公请辞清华大学副校长、全职执掌西湖大学

警惕典型宣传的“普洛克路斯忒斯症”

社会观察

眉 间 尺

古希腊神话里有个普洛克路斯忒斯。他喜欢把捉到的人放到一张特制的铁床上,身体超过床长的,就砍短,不及床长的,则拉长。被他“处理”过的人,倒是符合了床的标准,却大都一命呜呼了。普洛克路斯忒斯在现实生活中当然是不存在的,但有的时候,我们的典型宣传却会犯和普洛克路斯忒斯相似的毛病,不妨称为“普洛克路斯忒斯症”吧。 最近广受关注的“安全鹏”为自己辟谣的新闻就是一个例子。20年前,作为第三十八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金牌获得者,“安全鹏”三个字火了起来,以第一人书写的“事迹”被各路媒体广泛报道、转载,赚足了眼泪。20年后,安全鹏这个名字又“火”了一把。已是大学数学教授的安全鹏说他数学完全出于兴趣,和家庭基本没有什么关系,而流传了20年的“学

霸安全鹏”的故事里有太多虚假的成分。显然,当年制造安全鹏励志故事的人,就是一位或数位重度“普洛克路斯忒斯症”患者。 在他们心中,有一张标准的典型之床。捉到需要宣传的典型,就放到床上比一比,截长补短。我想,当年正是经过了这么一番“处理”,正常人安全鹏才成了励志版的“安全鹏”。值得警惕和注意的是,安全鹏在“维权”过程中本想编辑百度百科上自己的词条,结果不但通不过,反而说他传播“虚假信息”,就好比波月洞的黄袍怪成了衣冠楚楚的驸马,老实巴实的取经人倒变成了铁笼里的老虎精。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普洛克路斯忒斯症”感染广泛,生气勃勃的新媒体也未能幸免,确实到了不治不行的地步了。 有一种说法,认为“安全鹏事件”说明社会根本不需要什么典型宣传。对此,我不敢苟同。应该说,先进典型既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每个社会都需要的。作为一个社会中先进的精神和文化的人格化呈现,

先进典型为社会注入了向前向上的力量。它如同一盏灯,帮助人们超越眼前的局限,感受生活的意义,看清前行的目标。而典型宣传的意义就在于用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的方式,阐释并传播这种力量。一个没有先进典型或有典型而得不到珍视、不被人颂扬的社会,迟早会陷入消极沉寂、犬儒盛行的境地。 因此,“安全鹏事件”给我们提出的真问题其实是如何治愈典型宣传的“普洛克路斯忒斯症”。我认为,治病的主药有两味。一味叫“真实性”,另一味叫“文学性”。典型宣传不能向壁虚构。它既需要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也需要叙述者真诚的态度,简言之,以真情讲述真实。不过,典型宣传虽以真实为第一要义,也不能像一张履历表那么干巴巴。正所谓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任何成功的典型宣传都无法回避适度的文学描写。从这个意义上说,近几年兴起的“非虚构写作”或许更贴合典型宣传应有之态度。实际上,我国典型宣传的典范之作如反映数

学家陈景润事迹的《哥德巴赫猜想》就是如此。在这篇名作中,徐迟先生以充满文学性的笔法,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更重要的而是,挖掘出一种令人振奋的精神。 当今的中国社会发展在为人们开辟广阔多元的自我成就渠道的同时,也对人才素质不断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今天的青年依然需要奋斗的精神,但他们定义的“成功”的内涵和方式和20年前的安全鹏有了很大不同。他们面临更多的挑战,在实现自我的路上可能遭遇的竞争也更加复杂和激烈。悲情式、苦情式的奋斗者“人设”在20年前或许有较好的市场,时至今日即便还能打动一些人,也失去了包打天下的威力。今天的人们,尤其是青年,愿意接受的不是“套路”里印出来的“模范”,而是“同一个梦想、不同的奋斗”“不同的人生、同样的精彩”的人生故事。我想,这是安全鹏自我辟谣终获成功并得到人们点赞的深层原因,也是我们今天重申和改进典型宣传的现实起点吧。

有口皆评

师德师风 事关现代大学建设目标

王 钟 的

闹得沸沸扬扬的北航教授陈小武性骚扰女学生事件,最终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迅速查并对其采取最严厉处分而告一段落。在公众为教授利用职权性骚扰学生感到愤愤不平之际,有必要深入思考的是,为什么传统观念里人际关系简单、思想单纯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会产生如此严重的性骚扰事件。 当下,并没有证据表明发生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性骚扰事件的频次高于社会其他部门,但是,隐蔽性强、同一起案件受害者众多却是这些地方已曝光性骚扰事件的共同特征。以陈小武性骚扰事件为例,当事人在12年前读博期间遭遇性骚扰。时隔那么多年,她才有勇气实名举报,将不堪往事和盘托出。而伴随着她的举报,陈小武的性骚扰行为才“拔出萝卜带出泥”,更多受害者通过不同形式公开陈小武的劣行。 高校的封闭性和权力关系的单一性,无疑是性骚扰事件无法得到及时有效制裁的重要原因。学生遭遇性骚扰后,担心自己的学业受到极大影响,担心举报失败之后受到骚扰者的打击报复。与充满流动性的社会机构相比,学生反抗不良教师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正因如此,国内高校应当借鉴世界一流大学对学生完善的保护制度,以更强有力的措施为学生撑腰。

中起主导作用。

个别涉性骚扰的教师被查实以后,有关机构的处理不痛不痒,也加剧了受害者的担忧。近日据澎湃新闻报道,厦门大学原博士生导师、历史学系教授吴春明涉“诱奸女学生”后,于2014年10月被厦大开除党籍、撤销教师资格,但在不久以后“复出”,不仅继续参加学术活动,还依然在厦大下属机构工作。在处置有性骚扰行为的工作人员时,高校和科研机构不宜高举轻放,应当将其一撸到底,还受害者以学术空间清明的信心。 可能有人认,一些科研工作尽管在道德和人品上存在问题,但其科研能力是扎实的,因为道德作风问题就彻底断掉其科研工作的前程,对科研工作损失太大。这种观点无疑是粗陋的。且不论社会正义高于一切,科研工作并非天然高人一等,就算以科研绩效本身衡量,对不良科研工作者采取姑息态度,看似维护了学术秩序的一时安定,实则危害科研工作的长远利益——那些受侵害的学生难道不是科研的未来生力军? 所有的教师性骚扰案件,本质上都是滥用学术权力和教育权力的表现。他们与学生之间产生不正当关系,并非社会意义上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交往关系。作为这些权力的赋予者,高校和科研机构有义务纠正这种滥用权力的行为。退一万步说,一个教师胆敢把学术权力用在不当的地方,谁又能保证他在科研和教学中守规矩? 目前,很多发生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性骚扰案件的解决,依赖于媒体曝光形成舆论热点后,倒逼有关部门积极处理的模式。显然,被曝光并得到有效问责的仅仅是少数,也许还有大量性骚扰案件依然深埋地下,或者当事人举报以后未得到重视。高校和科研机构必须确立这样一个观念:师德师风不仅事关私德,事关个体学生权益的维护,更事关整体学术氛围,事关现代大学的建设目标。



学生姓名、所在班级、家长姓名、家长联系方式……覆盖合肥多所中小学、2万余条内容详细的学生信息,被以9000元的“打包价”卖给培训机构。近日,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案件中仅4毛钱就可买到一名学生就读信息和家长电话。 视觉中国

别把你的大脑当搜索框

饶高琦

现代汉语大词典中,知识被定义为人在社会实践中获得的认知和经验的总和,以及学术、文化或学问。对于渔民、海洋生物工作者,流蓝血的“蟹”可能是有用的认识,因为这是掌握它的人生活和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但脱离了这些,蟹流蓝血就从知识变成了聊以打发时间的谈资和“知道”。事实上众多答题用户自己也都是边听题,边在网络的“x x知道”上搜索答案。 现在越来越多的智能外挂和答题机器人加入大战,也纷纷表现出了远胜于人的精度和速度。但是自从2011年IBM Watson在电视答题中完胜人类冠军后,这类事件就再也无法引爆媒体了。但谁要说直播答题和曾经的电视答题里学到的是“知识”,那可就得大大地打个问号了。 电影《泰坦尼克号》男主角为女主角画的是什么呢?哪种海洋动物的血不是红色?盐度最低的海是哪个?准备充分的用户或许能够迅速抢出答案。但这里的“素描”“蟹”和“波罗的海”真的是知识吗?

化信息则成为知识,而金字塔尖的智慧则是为达成目标而运用知识的能力。由此不难看出,“《泰坦尼克号》中的杰克给露丝画过素描”这一点在绝大多数场景下,不过是数据或信息。 目前,知识图谱因其对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的巨大作用,成为了学术界和工业界下大力研究的领域。典型的知识图谱由大量的实体和实体之间的表示不同关系的链接构成。知识图谱本身是知识,而里面的节点只是数据。这也说明,只有互相关链接,具有结构和功能,形成体系的数据才能成为知识,才能为真正解决问题提供帮助。“知道”和“知识”之间,还差着一张“大网”。 德国哲学家尼采写过一篇文章叫《我为什么这么聪明》。他的回答是:我之所以这么聪明,是因为我从来不在不必要的的事情上浪费精力。各种精心设计答题竞赛本身绝对是娱乐工业智慧和知识的结晶,但指望从题里学到知识,就大错特错了。毕竟你的大脑不是被设计出来当搜索框用的。

药品上市不是监管的终点

李 颖

儿科“神药”匹多莫德最近成为社会关注热点。针对北京和和睦家医院医生、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药理学硕士董连梅列出的“该药存在临床疗效和安全的不确定性”等四点质疑,尽管引发了不同的观点碰撞,但最终依然没有一个权威机构作出回应。 近几年,对于药物的疗效、安全性提出质疑,呈现出越来越普遍的趋势,尤其是医生对某个药物提出质疑。事实上对有些药物,在不同的医生那里,或多或少都存在这样那样的质疑。 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笔者认为,医生通过大胆质疑来体现社会责任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只有提出质疑,才能不断改进,防范风险,最终趋于完善。 针对质疑,管理机构应给质疑者打开一扇门,让质疑声有一个正确的传输途径,毕竟医生的质疑是为了药品性能更加

完善。

具体到此次匹多莫德遭质疑的疗效及安全性问题。医生的质疑已经引起各界的关注,但更为重要的是权威部门的跟进,由科学界来做出决定,通过更为严格、规范的评审流程,让广大医生在开药时更有信心,也让中国儿童不要一直充当“小白鼠”。 事实上,我国新药审批和伦理监管制度非常严格。但药品获得上市许可并不意味着药品监管的终点,而且,药品的安全评估必须贯穿其整个使用期间。只有结合权威的医学专业理论和循证科学的评估程序,才能正确地做出药品不良反应的再评价,并指导消费者和患者合理用药。 我们有理由相信董连梅给“神药”扒皮很快会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和回应,更期待在上市药品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估上,相关部门做得更好一些。用药安全只有从消费终端提前到临床前端的监管,才能让老百姓更放心。

虚假经济数据“看上去很美” 实际危害“猛于虎”

张景阳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在全区经济工作会议上公开承认,财政和经济数据大幅造假。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一位研究员向科技日报记者透露,挤出水分后,全区调减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30亿元,占总量的26.3%,核减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900亿元,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40%……而去年以来,经济数据注水已不是个例,除辽宁省首曝“家丑”外,云南、湖南、吉林、重庆4个省市的10个市县(区)虚增财政收入就达15.49亿元。 客观来看,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营造出的各地区竞争环境与长期以来唯GDP、唯经济增速的政绩观,让经济数据造假的出现成为可能。前者绝不能成为造假的正当理由,而后者,才是各地政府真正应该反思的根源:经济数据的注水,源自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出现了偏差。正如辽宁省曝出数据造假之后,时任省委书记李希评价所说:“哪位同志担任负

责人,都想让本地区发展快一点,数据好看一点,这是一种担当。但我们追求的政绩,要对党的事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这是更大的担当。” 地方的经济数据是地方经济发展动态的量化指标,是中央对地方经济发展实施决策、制定政策重要依据。如果地方经济数据失真,会直接导致中央对地方经济发展形势的误判,进而影响施策的科学性和精准性,最终可能造成宏观经济数据失真的恶果。更为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经济数据造假,说到底就是政府公信力流失的过程,因为最终为这些虚假数据买单的,是社会,是群众。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看上去很美”的虚假财政数据,其实是“猛于虎”的危害。 经济数据事关国计民生,来不得半点虚假。在新时时代中,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更应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以“唯实”赢得公信力,用“务实”创造发展力,使求真务实、科学高效的执政理念在全社会蔚然成风。